

产业链价值链专题

# 全球价值链重构下的 拉美调整与再定位\*

岳云霞

**内容提要：**本文采用 UNCTAD - Eora 全球价值链数据库，测算了拉美国家 2006—2021 年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及其地位指数，从地区总体、国家以及产业部门三个角度入手，全面讨论了拉美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典型特征与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本文考察了拉美商品贸易结构的变化趋势，分析了该地区进一步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条件与可能边界。研究结果表明，在全球价值链重构“泛安全化”趋势上升的背景下，拉美具有地缘、制度和规则三重短期优势，并具备禀赋、产业和绿色三大中长期优势，近年来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得到了总体提升。但产业和国别异质性也开始显现，加勒比和中美洲多数国家及墨西哥受益较多，更多加入全球产业链下游；南美国家继续以原材料供应者身份保持在产业上游，但部分国家被边缘化的现象明显。中国应对拉美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受益的形势形成充分预判，结合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建设，积极主动调整对拉经贸合作战略与战术。

**关键词：**价值链 重构 参与度 地位 外包

**作者简介：**岳云霞，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F114.4；F14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 6649 (2023) 04 - 0056 - 20

---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双循环新格局下中国与拉丁美洲经贸关系的发展与挑战研究”（编号：21AGJ013）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项目“拉美现代化的经验与教训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 一 全球价值链重构的研究与政策综述

全球价值链（GVC）是在全球范围内连接研发、设计、制造、销售、物流、售后等分工环节，以实现商品和劳务价值的网络性组织<sup>①</sup>，其中包含了全球产业链和全球供应链<sup>②</sup>。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价值链网络逐步形成。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全球贸易自由化水平提升，国际运输成本和通信成本降低带动贸易便利化水平同步改善，这使得全球价值链贸易快速发展，在2008年时已占到国际贸易的52%左右，其增长主要集中在机械、电子、交通和服务部门，在此类行业拥有比较优势的东亚、北美和西欧地区成为全球三大价值链中心<sup>③</sup>。全球价值链贸易带来明显的经济收益<sup>④</sup>，专业化分工和规模经济推动了生产率的提高以及生产价格的降低<sup>⑤</sup>，从而带来了较大幅度的收入增长。据世界银行估算，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每增加1%，人均收入增长将超过1%，远高于标准贸易带来的0.2%的收入增长<sup>⑥</sup>。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价值链的扩张出现拐点，三大边界约束的抑制效应日益明显。一是分配和分工边界。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所谓的

---

① UNIDO, “Industrial Development Report 2002/2003: Competing Through Innovation and Learning”. <https://open.unido.org/api/documents/4692446/download/UNIDO-Publication-2002-4692446>. [2023-05-26]

② 宋华、杨雨东：《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内涵与发展路径探析》，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第48-50页；杨丹辉：《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趋势与关键影响因素》，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年第7期，第32-40页；王存刚：《全球价值链重构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政策新趋向》，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年第9期，第64-75页，第93页。

③ 世界银行：《2020年世界发展报告：在全球价值链时代以贸易促发展》。<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server/api/core/bitstreams/ee8def1b-45e2-5ff8-8cdc-0152596c9696/content>. [2023-05-26]

④ OECD, *Interconnected Economies: Benefiting from Global Value Chains*, OECD Publishing, 2013. <https://dx.doi.org/10.1787/9789264189560-en>. [2023-05-26]

⑤ D. Andrews, P. Gal, and W. Witheridge, “A Genie in the Bottle? Globalization, Competition and Inflation”, in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s*, No. 1462, OECD Publishing, 2018. <http://www.oecd.org/officialdocuments/publicdisplaydocumentpdf>. [2023-05-26]

⑥ 世界银行：《2020年世界发展报告：在全球价值链时代以贸易促发展》。<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server/api/core/bitstreams/ee8def1b-45e2-5ff8-8cdc-0152596c9696/content>. [2023-05-26]

“微笑曲线”中，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处于“价值洼地”，进入门槛低但竞争激烈，其低成本优势在逐渐消失，意图向价值链高端升级和转型；而发达经济体则处于“价值高地”，力图“规锁”前者<sup>①</sup>，使其处于低端锁定位置<sup>②</sup>。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分配失衡和利益冲突问题日益突出，贸易摩擦加剧，进一步推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上升。据全球贸易预警网络（GTA）统计，2008 年 11 月至今，全球出台的 53959 项贸易相关政策中，仅有 17.2% 为有利于贸易自由化的“绿色政策”，而 80.6% 为有损贸易利益的“红色政策”，2.2% 为可能有损贸易利益的“橙色政策”。<sup>③</sup> 二是去工业化边界。随着新能源和数字经济引领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不断深入，以智能制造为代表的新型制造技术彻底改变了制造业生态，重构了全球价值链中制造环节的创新功能、增值能力和要素投入，进而提高了制造环节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这促使发达国家重提“再工业化”，相继出台产业政策，为在本国建厂的制造业企业提供补贴、税收优惠等，鼓励制造业回流，对前期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经济效益考虑占优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形成干预<sup>④</sup>。三是经济一体化边界。在多边贸易合作屡遭挫折的情况下，全球贸易治理模式加速调整，WTO 领导下的全球贸易谈判进入新时期，诸边协议和区域性贸易安排（RTA）上升。据 WTO 统计，1995 年 WTO 生效时，全球通告的已生效 RTA 累计数量仅为 55 项；而至 2023 年 8 月时，该累计数量已达 593 项，增长了近 10 倍<sup>⑤</sup>。区域贸易安排对 WTO 所涵盖的经贸规则进行了深化与更新，推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

① 张宇燕、冯维江：《从“接触”到“规锁”：美国对华战略意图及中美博弈的四种前景》，载《清华金融评论》，2018 年第 7 期，第 24-25 页。

② D. Ernst, “Industrial Upgrading through Low - Cost and Fast Innovation - Taiwan’s Experience”, in *East - West Working Papers*, Economic Series, 2013, p. 133; P. Gehl Sampath and B. Vallejo,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Upgrading: What, When and How?”, in *MERIT Working Papers*, No. 2018 - 016, 2018; 吕越、陈帅、盛斌：《嵌入全球价值链会导致中国制造的“低端锁定”吗？》，载《管理世界》，2018 年第 8 期，第 11 - 29 页；唐宜红、张鹏杨：《中国企业嵌入全球生产链的位置及变动机制研究》，载《管理世界》，2018 年第 5 期，第 28 - 46 页。

③ 全球贸易预警网统计。https://www.globaltradealert.org/global\_dynamics. [2023 - 08 - 09]

④ 倪红福、张志达：《全球价值链重构与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载《清华金融评论》，2022 年第 10 期，第 48 - 51 页；于畅、邓洲：《新一代信息技术驱动下的全球价值链调整及其应对策略》，载《全球化》，2021 年第 2 期，第 89 - 101 页；赵书杰：《全球价值链重构视角下美国制造业回流影响研究》，河北大学 2018 年硕士学位论文；World Economic Forum, “A Global Rewiring: Redefining Global Value Chains for the Future”, 2022. https://www3.weforum.org/docs. [2023 - 05 - 26]

⑤ WTO RTA 数据库。http://rtais.wto.org/UI/PublicMaintainRTAHome.aspx. [2023 - 08 - 09]

展，也使得全球价值链体系日益向去中心化、分散化演变<sup>①</sup>。

在边界约束条件下，全球价值链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在 2008 年之后几未变化，而全球复杂生产网络引发的风险逐渐得到关注。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对供应链专家的系列采访显示，从跨行业平均来看，企业每 3.7 年就会发生一次持续一个月或更长时间的供应链中断，这些中断使其每 10 年的预期损失平均达到年度税前收益的 42%<sup>②</sup>。2020 年以来，全球新冠疫情发生、乌克兰危机暴发引发了供应链的经常性中断，而全球政治经济的不确定以及中美贸易冲突的持续更是加大了各国对供应链韧性的担忧。在此背景下，全球价值链重构逐步加大了以“安全”或“去风险”为核心的三重调整。

第一重是供应链安全下的价值链本土化、短链化调整，重在推动部分产业链分工环节回流本国，或者布局到邻近国家，从而缩短跨境供应链距离，降低因供应链过长而遭受不可控的外部冲击的风险。相应的政策调整主要体现在为各国出台的产业政策，如美国奥巴马政府期间的《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和《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特朗普政府期间的《美国先进制造业领导战略》和拜登政府出台的《芯片与科学法案》《国家先进制造业战略》和《2022 年美国竞争法案》等，德国的《国家工业战略 2030》和《联邦政府数据战略》，日本的“经济刺激计划”和《综合创新战略 2022》，以及印度的《印度制造业国家战略》等。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的研究显示，在 2009—2019 年期间，全球贸易政策中产业政策的比重从 19% 上升到 47%；高收入国家实施的产业政策平均是中低收入经济体的 5 倍左右，且运用产业政策的主要是中等收入工业经济体（如金砖国家），而低收入国家实际上没有产业政策<sup>③</sup>。

第二重是经济安全下的价值链近岸化、多样化调整，重在周边国家及主要地区形成价值链的战略性多点布局，避免依赖部分经济体。相应的政策措

<sup>①</sup> 史丹、余菁：《全球价值链重构与跨国公司战略分化——基于全球化转向的探讨》，载《经济管理》，2021 年第 2 期，第 5—22 页；程大中、姜彬、魏如青：《全球价值链分工与自贸区发展：内在机制及对中国的启示》，载《学术月刊》，2017 年第 5 期，第 48—58 页；M. Boffa, M. Jansen, and Olga Solleder, “Do We Need Deeper Trade Agreements for GVCs or just a BIT?”, in *The World Economy*, Vol. 42, No. 6, 2019, pp. 1—27; E. Laget, A. Osnago, N. Rocha and M. Ruta, “Deep Trade Agreements and Global Value Chains”, in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8491,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18.

<sup>②</sup>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Risk, Resilience, and Rebalancing in Global Value Chains”, 2020. <https://www.mckinsey.com/capabilities/operations/our-insights>. [2023-05-26]

<sup>③</sup> UNIDO, “Global Industrial Policy: Measurement and Results”, in *Policy Brief Series: Insights 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ssue 1, March 2023. <https://www.unido.org/sites/default/files>. [2023-05-26]

施以美国政府的“近岸外包”和地区性多边倡议为典型，如 2020 年的“经济繁荣网络”、2021 年“蓝点网络计划”和“重建更美好世界”，以及 2022 年的“印太繁荣经济框架”和“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在制造业本土回流成效有限的情况下，美国上述政策措施期待能够将价值链回调至美国周边，并在亚太等重点地区形成“中国 + 1”的价值链和供应链替代方案。与美国相同，欧盟和日本也在推行外部“多样性”价值链调整方案。在 2020 年 11 月关于欧洲新工业战略的决议中，欧洲议会呼吁采取行动加强、缩短供应链并使其多样化，以使其更具可持续性，并减少对有限市场的过度依赖。它还要求欧盟委员会制定智能回流战略，将产业重新部署回欧盟，增加生产和投资，并重新安置工业制造。此外，欧盟扩大了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与哥伦比亚、秘鲁、加拿大等美洲国家以及越南、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构建其全球价值链中的新伙伴。日本政府则发起总额高达 2435 亿日元的“百亿补贴”计划，以推进供应链改革项目，其中 2200 亿日元用于资助日本企业将生产线迁回日本本土或转至东南亚地区。

第三重是政治安全下的价值链友岸化、意识形态化调整，重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突出价值观的一致或相近性。相应的政策措施以美国的“友岸外包”为典型，强调美国将与“可信任的友好国家”一起构建新的供应链，缓解供应链体系的脆弱性，尤其是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拜登政府出台了鼓励价值链流向友好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案》《通胀削减法案》和《芯片与科学法案》，推出所谓的“民主供应链联盟”，要在理念相近的区域优先强化供应链的韧性；成立“芯片四方联盟”，指出必须会同盟友构建“科技民主联盟”；与欧盟联合宣布成立贸易与技术委员会，声称将以“共同的民主价值观”为基础，在投资审查、出口管制、人工智能、半导体供应链、全球贸易挑战等五大领域加强合作。<sup>①</sup>此外，美国筑牢“小院高墙”，严格限制向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等受关注国家投资<sup>②</sup>。欧盟也采取了类似的理念，其发布的《塑造欧洲的数字未来》《人工智能白皮书》和《欧洲数据战略》三份数字战略文件提出，欧洲社会的数字技术赋权根植于共同价值观，强调欧洲价值观和道德规则以及社会和环境标准必须适用于数字空间。

<sup>①</sup> 王存刚：《美国等西方国家在高新科技领域的行动与影响》，载《中国信息安全》，2022 年第 10 期，第 78 - 82 页。

<sup>②</sup> U. 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Outbound Investment Program”. <https://home.treasury.gov/policy-issues/international/outbound-investment-program>. [2023 - 08 - 09]

可以看到，全球价值链重构中，发达国家在政策上呈现出更为积极的主动调整态势，其调整方向和内容体现了突出的“泛安全化”特征，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考虑有超越经济效益考虑之势，在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当前调整中发挥更大作用。在此背景下，中短期内，与美欧等西方国家地理临近、民主体制相近或价值观接近的地区成为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倾斜的重点。而拉美除了兼具上述三“近”特征外，还集中了美国对外缔结自由贸易协定中的一半，并与欧盟、日本等经济体签有较为广泛的自由贸易协定，在机制建设上具备了承接新一轮产业链和供应链转移的优势条件。

## 二 拉美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模式与地位

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推动下，拉美地区整体参与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节奏加速，但国别层面和产业层面的多样性显著。本文通过从产业和国别两个维度拆解全球价值链数据，对拉美地区和国家在全球产业调整中的特征与趋势加以量化刻画。

### （一）研究方法

为了反映拉美地区及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本文采用罗伯特·库普曼提出的 KWW 方法<sup>①</sup>，基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 Eora 全球价值链数据库（UNCTAD – Eora Global Value Chain Database），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以及全球价值链地位两个角度分别考察拉美地区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现状与分工情况。

其中，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表示某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其数值越大，表明该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参与程度就越高。该指数可分解为前向参与度（Forward GVC Participation）和后向参与度（Backward GVC Participation）两个指标。前向参与是指该经济体通过向下游生产阶段出口国内生产投入品的方式参与全球价值链，而后向参与则指该经济体通过进口外国投入品来生产本国用于出口的货物和服务的方式参与全球价值链。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的计算公式如式（1）：

---

<sup>①</sup> R. Koopman, W. Powers, Z. Wang, and S. - J. Wei. “Give Credit Where Credit Is Due: Tracing Value Added in Global Production Chains”, in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16426, Inc., 2010. DOI: 10.3386/w16426. [2023 – 05 – 26]

$$\text{GVC participation} = (\text{FVA} + \text{DVX}) / \text{Gross Exports} \quad (1)$$

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表示某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其数值越大，表明该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上就处于更上游的生产阶段；反之，则表明该经济体位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相对下游的位置。其计算公式如式（2）：

$$\text{GVC position} = \ln(1 + \text{DVX}/\text{Gross Exports}) - \ln(1 + \text{FVA}/\text{Gross Exports}) \quad (2)$$

在式（1）式和式（2）中，国外增加值（FVA）为某经济体出口的境外增加值，即其他经济体生产的增加值由其出口的部分；间接附加值（DVX）表示被其他经济体用作出口投入的境内附加值，即该经济体境内增加值由其他经济体用于出口的部分；Gross Export 为总出口。

Eora 数据库提供了 190 个经济体及其 26 个行业部门在 1990—2021 年期间的全球价值链关键指标。本文以拉美地区为重点，基于对全球价值链重构考察的目标，选取 2006—2021 年为分析时段，从 Eora 数据库中筛选出 26 个拉美国家，得到各国各部门的增加值贸易数据，并进而对各国及地区层面的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标进行核算。

## （二）典型事实<sup>①</sup>

### 1. 拉美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总体情况

长期以来，拉美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甚至不及最不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sup>②</sup>，但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背景下，2006—2021 年期间，其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的均值有了一定幅度的提升，从 33.9% 上升至 41.8%，年均增长 0.5%，增速虽远低于亚洲地区<sup>③</sup>，但客观上仍促进了地区就业提升和经济增长，对拉美国家进一步参与全球分工形成正向激励。在此期间，除了 2009 年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拖尾效应影响而呈现了较为明显的收缩外，拉美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平均参与水平呈现平缓上升的态势，2016 年以来增速有所加快，2018 年以来则出现了近期第二次小幅跳升，显示

<sup>①</sup> 如无特殊说明，本节数据均为作者根据 UNCTAD - Eora 全球价值链数据分解计算。

<sup>②</sup> 基于 UNCTAD - Eora 全球价值链数据库数据的核算显示，2010 年，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世界均值为 57%，发达经济体平均为 59%（其中，欧盟为 66%，美国为 45%），发展中经济体平均为 52%，最不发达国家平均为 45%。参见国际劳工局：《全球供应链中的体面劳动》，国际劳工大会第 105 届会议，报告四，2016 年。<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 [2023 - 05 - 26]

<sup>③</sup> 2010 年以来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增长最快的区域是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年均增长达到 4% 以上。参见中国商务部网站：《抓住全球价值链调整期的新机遇》，2021 年 1 月 3 日。<http://zys.mof.com.gov.cn/article/qjzj/202101/20210103034082.shtml>. [2023 - 05 - 26]

地区国家正在加快融入全球产业分工（见图1）。

从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形式来看，拉美地区后向参与的改善相对突出。在2006—2021年期间，拉美地区的后向参与度总体高于前向参与度（见图1）。其中，前向参与度略有提高，大体在15%上下；而后向参与度从19.8%增至26.3%。这表明，拉美地区在当前全球价值链的调整中，囿于其自身技术能力和制造业发展水平，对贸易伙伴加工产品再出口中间品的能力并未发生显著提升，也未能在设计、研发等上游环节产生较大突破，但其通过扩大出口加工区等政策优惠，提高了自身在加工组装等终端环节中的参与，对未来制造能力的提升准备了可能条件。与此同时，这也会导致拉美国家对外部中间产品投入产生较高依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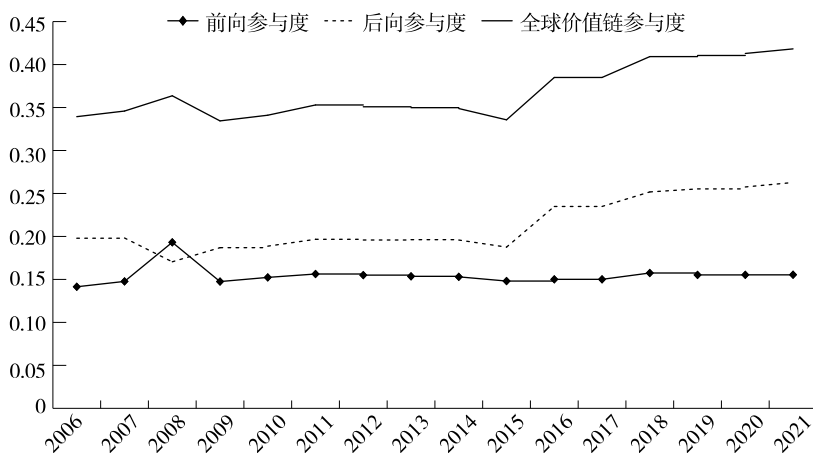


图1 拉美地区全球价值链的平均参与度（2006—2021年）

资料来源：根据 UNCTAD - Eora 全球价值链数据库数据计算。

从在全球价值链的嵌入位置来看，拉美地区向下游移动的趋势同样明显。在考察期内，除了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之外，拉美地区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均为负值，且对应于其平均参与度指数的两次跃升时点，在2016年和2018年之后降幅明显（见图2）。由此，拉美地区对域外增值的依赖程度大于其他地区对其间接增值的依赖，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较低，处于相对低端或下游位置。同时，拉美地区平均地位指数的下降进一步验证，拉美地区在“在岸外包”“近岸外包”和“友岸外包”等供应链政策调整下，加大了在全球制造终端环节的参与，且对外依赖程度在持续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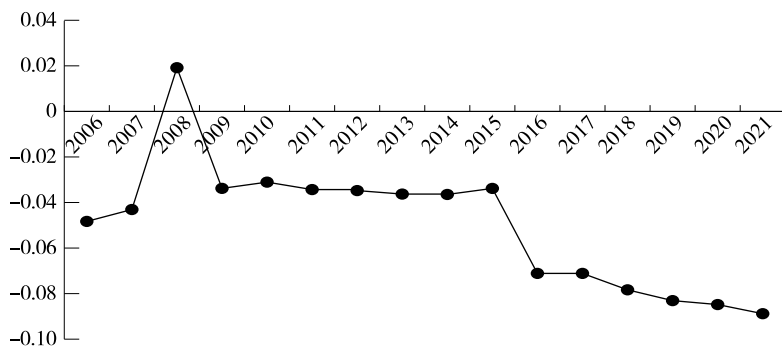


图 2 拉美地区全球价值链的平均地位指数 (2006—2021 年)

资料来源：根据 UNCTAD - Eora 全球价值链数据库数据计算。

## 2. 拉美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国别情况

拉美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深度呈现出分化趋势，加勒比、中美洲和墨西哥两大次区域较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与合作，而南美地区的参与度整体偏低。2021 年拉美各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显示，在数据可获的地区 26 国中，安提瓜和巴布达、巴巴多斯、巴哈马、墨西哥、伯利兹、巴拿马、牙买加、海地和智利等 9 国的指标值高于地区平均水平，当中有 5 国为加勒比国家，3 国地处中美洲和墨西哥区域，仅有智利 1 国位于南美地区（见表 1）。其余 17 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均在 40% 及以下，特别是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和巴拉圭等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国的指标值在地区排名靠后，而秘鲁和哥伦比亚等太平洋联盟成员国的指标值也相对偏低，显示其在全球与区域性合作中价值链分工的参与水平相对较低。

表 1 拉美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2021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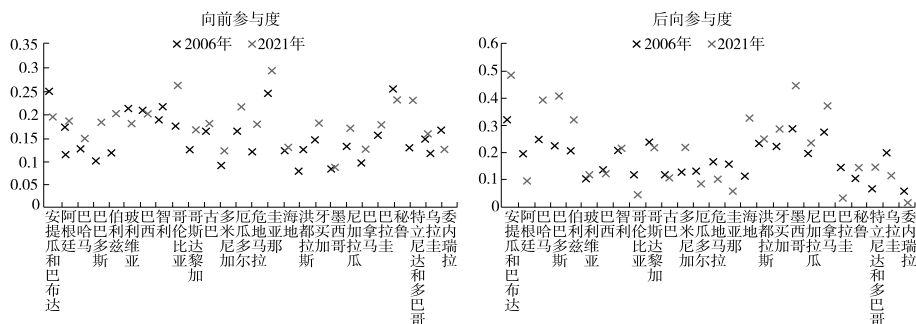
国家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 (%)	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	国家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 (%)	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
安提瓜和巴布达	68.0	-0.218	洪都拉斯	37.4	-0.105
巴巴多斯	59.2	-0.175	圭亚那	35.3	0.200
巴哈马	54.1	-0.194	多米尼加	33.9	-0.086
墨西哥	53.3	-0.287	巴西	32.3	0.071
伯利兹	52.1	-0.093	哥伦比亚	31.3	0.186
巴拿马	49.8	-0.197	玻利维亚	30.0	0.055
牙买加	46.7	-0.086	厄瓜多尔	29.8	0.114
海地	45.7	-0.160	阿根廷	28.6	0.077

智利	43.4	0.000	危地马拉	28.5	0.065
尼加拉瓜	40.4	-0.053	古巴	28.4	0.067
哥斯达黎加	38.3	-0.041	乌拉圭	27.4	0.041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38.0	0.068	巴拉圭	21.1	0.135
秘鲁	37.8	0.073	委内瑞拉	14.1	0.105

资料来源：根据 UNCTAD - Eora 全球价值链数据库数据计算。

拉美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位置具有异质性，加勒比和中美洲国家多处于产业下游，而南美国家则处于上游。除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圭亚那、危地马拉和古巴外，其余加勒比和中美洲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较高，但地位指数均为负值，且后向参与度指数的地区排名偏高，表明其相对于地区其他国家已经率先加大了全球产业联系，现处于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下游位置。南美国家与上述加勒比例外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为正值，但其参与度指数较低，表明这些国家在全球分工中主要作为原材料供应者，出现在产业链和供应链上游。

拉美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态势同样存在一定差异性。2006—2021 年期间，仅有危地马拉、玻利维亚、巴西、圭亚那、乌拉圭、阿根廷、委内瑞拉和巴拉圭等 8 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下降（见图 3）。其中，南方共同市场 4 国、圭亚那、危地马拉突出表现为后向参与度降低，显示其在产业链下游的活动有整体撤回的趋势；玻利维亚主要表现为前向参与度降低，显示其在原材料供应领域的相对萎缩；委内瑞拉则表现为前后向参与度的同步降低，这与其近年来遭遇外部封锁的客观环境形成一致。其余 18 国的参与度指数则有不等提升，跃升最快的国家除了墨西哥和巴拿马之外，均为加勒比国家，其后向参与度的改善明显大于前向参与度；而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等少数南美国家的前向参与度增幅更大，显示其在国际原材料市场的地位相对提升（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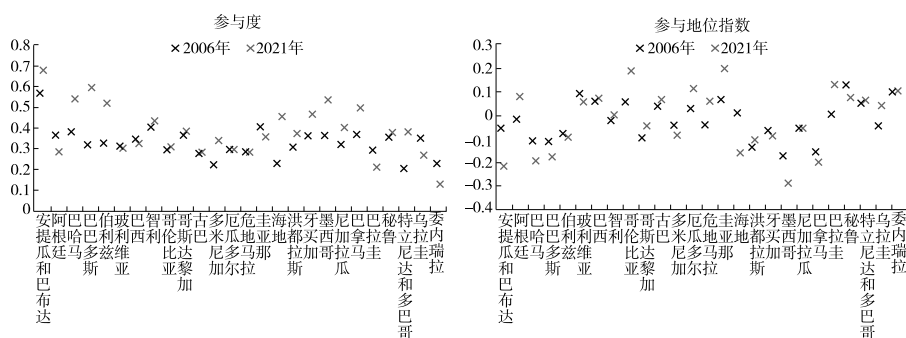


图3 拉美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 UNCTAD - Eora 全球价值链数据库数据计算。

### 3. 拉美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产业情况

拉美各产业部门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情况有所不同，但其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格局中的位置保持稳定。根据 UNCTAD - Eora 全球价值链数据核算的参与度指数显示，2006 年以来，拉美地区在全球产业中的嵌入程度在不同的产业板块呈现一定差异性，大体呈现如下四类形态：（1）在回收业、电气机械制品、运输设备和其他制成品等亲资本、亲技术和亲终端消费的产业部门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最为深入，相关部门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均为负值，体现该地区参与模式为进口中间产品并进行下游加工装配；（2）在金属制品、采掘业等资源和资本密集型产业部门，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较高，且地位指数均为正值，表明该地区依托其资源优势，在产业链和供应链上游以供应者身份嵌入全球生产；（3）在石油、化学和非金属矿物制品、纺织品和服装、木材和纸制品等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拉美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均为负值，表明其一定程度嵌入了全球产业链下游；（4）在农业、渔业和服务业等部门有限参与了全球分工合作（见图 4）。

拉美各产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变化则呈现了与世界大体同步的趋势。2006—2021 年期间，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增幅超出地区平均水平的 9 个部门中，除了电气机械制品和运输设备两个制造业部门及渔业部门外，其余 6 个部门均属服务业，即公共行政管理，零售业，教育、卫生和其他服务，邮政和电信业，金融中介和商业活动，电力、燃气和水供应业。上述服务部门中，除了邮政和电信业外，其余部门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均为略大于零的正值，表明拉美地区在服务业领域正在跟随全球产业的调整步伐，加大了全球化产业融入，但受限于其服务业功能与竞争力，当前仍主要是提供基础服务或公

共服务，尚未在高附加值服务部门形成突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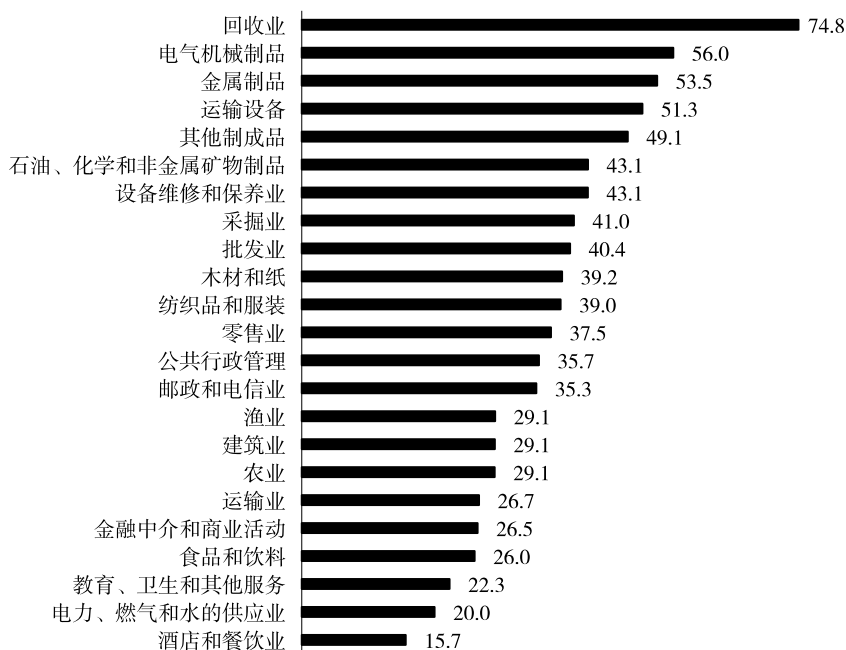


图4 拉美各产业部门全球价值链参与度（2021年）（%）

资料来源：根据 UNCTAD - Eora 全球价值链数据库数据计算。

拉美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产业参与情况与其资源禀赋和竞争优势有关联。在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方面，拉美26国参与度指数最高的前三大产业部门形成了一定重叠，但差异性更为突出。具体而言，有10国（阿根廷、巴巴多斯、伯利兹、古巴、多米尼加、海地、牙买加、尼加拉瓜、巴拿马和巴拉圭）以交通设备产业作为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重点部门，且均处于产业链下游，完成加工组装等终端工序；有7国（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巴巴多斯、巴西、圭亚那、海地和墨西哥）主要通过回收业参与全球分工，也均处于产业链下游；有8国（智利、古巴、厄瓜多尔、危地马拉、圭亚那、洪都拉斯、巴拉圭和委内瑞拉）着重以采掘业加入全球价值链，处于产业链上游；有7国（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洪都拉斯、秘鲁和乌拉圭）重点通过批发业加入全球价值链，处于产业链下游。值得一提的是，拉美地区在金属制品部门或已形成一定的域内产业分工，地区15国主要通过该部门参与全球价值链，但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危地马拉、秘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委内瑞拉等8国在该部

门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为正，处于产业上游；而巴哈马、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厄瓜多尔、牙买加、尼加拉瓜和巴拿马等7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为负，处于产业下游。

拉美各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产业变化情况则显现出更大的差异性。2006—2021年期间，拉美26国中有3国存在较为严重的产业“去全球化”现象，其中，玻利维亚出现全产业<sup>①</sup>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下降；委内瑞拉除了采掘业外，其他产业部门的参与度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阿根廷除了公共行政管理以及电力、燃气和水供应业两个公共服务部门外，其他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也都呈下降态势。而从拉美各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增长最快的前三大产业来看，多数国家主要在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倚重的产业部门内发力，地区教育、卫生和其他服务以及回收业是近年来得到关注较多的部门，其中，前者在9国（多米尼加、厄瓜多尔、危地马拉、圭亚那、海地、洪都拉斯、尼加拉瓜、秘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增长较为突出，而后者则在8国（阿根廷、巴巴多斯、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海地、牙买加和墨西哥）有较大增长。

可以看到，随着全球价值链重构和各国产业政策的推出，拉美地区整体正在弥补其在全球价值链中嵌入有限的问题，但区域内各国在生产链和供应链调整中的功能分化明显。在地理上临近美国的加勒比和中美洲多数国家以及墨西哥成为当前调整的主要受益者，通过参与生产的下游环节提升了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并推动地区在全球价值链参与中总体提升和参与环节后移。南美多数国家在此轮调整中继续充当产业上游的原料提供者，同时也开始承接部分制造业的下游组装环节，但受益相对有限，部分南美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甚至出现回退，特别是玻利维亚、委内瑞拉和阿根廷在此轮调整中被边缘化的态势明显。包括巴西、哥伦比亚在内的南方共同市场与太平洋联盟两大区域一体化组织在内部协同与分工方面作用有限，其南美成员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偏低。与此同时，拉美地区的调整仍以应激式、被动性承接产业链转移为主，全球价值链短链化引发的在岸和近岸生产以及供应链韧性推动的友岸生产发生了一定作用，这在产业上表现为终端消费品、资本品的制造上升，回收业和教育、卫生及其他服务业也得到了关注，且美国的

<sup>①</sup> 在UNCTAD-Eora全球价值链数据库的26个产业部门中，本文着重考察第1个至第23个部门，略去第24个至第26个部门，即私人家庭、其他、再出口和再进口部门。

多数拉美自由贸易伙伴<sup>①</sup>在此轮全球价值链调整中表现更为突出。

### 三 拉美的潜力与可能边界

拉美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新表现对其商品贸易结构产生影响，这对其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可能潜力与边界形成条件，进而决定了在当前全球价值链重构中的拉美地位与对外合作方向。

#### （一）全球价值链与拉美贸易结构变化

在不断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拉美地区在全球贸易中的表现发生变化，2006—2021年期间拉美在全球进口中的比重从5.2%升至5.6%，2022年又进一步增至6.1%；同期，拉美在全球出口中的比重在5.5%上下波动。然而，在此过程中，其出口能力伴随进口的结构性调整有了全面提升。

#### 1. 贸易产品种类

新贸易理论认为，产品多样化可以减轻相对价格降低引致的贸易条件恶化<sup>②</sup>，特别是对于发展中经济体，出口多样化能够分散市场集中引致的价格波动风险<sup>③</sup>，代表着其出口能力的提升。2006—2021年期间，拉美地区整体增加了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特别是在产业下游的地区融入。受此影响，拉美地区进口产品种类增加了3.9%，而出口产品种类增加了1.3%（见图5）。比较分析进一步显示，拉美出口新增产品除了农产品、矿石、金属等产品外，集中于HS分类第84章（核反应堆、锅炉、机器、机械器具及其零件）、第85章（电机、电气、声像）、第87章（车辆及其零件、附件，但铁道及电车道车辆除外）、第88章（航空器、航天器及其零件）和第90章（光学仪器），显示其制造业出口产品的种类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拉美与当前三大主要贸易伙伴之间贸易产品的数量有着不同变化态势。在美欧传统市场上，拉美进口产品数量增加，这与其更为依赖中间产品进口的价值链贸易发展态势一致；但拉美出口产品数量减少。而

<sup>①</sup> 美国在全球的20个自由贸易伙伴中，有11个在拉美，即智利、哥伦比亚、秘鲁、墨西哥、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

<sup>②</sup> K. Hummelsd, “The Variety and Quality of a Nation’s Exports”, i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5, No. 3, 2005, pp. 704–723; W. Brodac, “Globalization and the Gains from Variety”, i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 Vol. 121, No. 2, 2006, pp. 541–585.

<sup>③</sup> 胡月、田志宏：《进出口多样化是否改善了贸易条件——基于全球农业贸易的证据》，载《国际贸易问题》，2021年第1期，第81–96页。

在新兴的中国市场上，拉美进出口产品数量均有所增长，其中，进口产品数量增加 4.5%，出口产品数量则大幅增长了 64%，且出口增加的产品种类集中于 HS 分类第 84 章和第 85 章。这种变化差异表明，拉美同新兴市场之间的产业联系加大，且出口抗风险能力有了较大提升，突出表现为制成品出口的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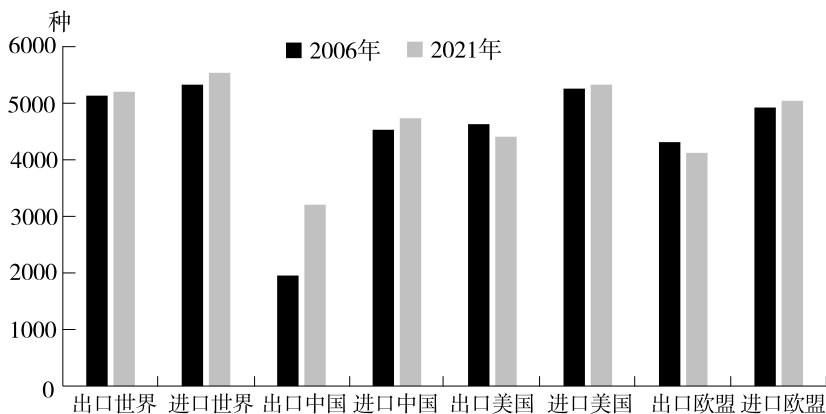


图5 拉美贸易产品的种类数

注：产品种类数根据 HS 6 位产品数统计。

资料来源：根据 Trade Map 贸易统计数据计算。

## 2. 贸易产品结构

价值链贸易的变化对拉美贸易结构产生了影响。2006—2021 年期间，拉美地区进口结构的显著变化表现为原材料等中间产品的增长相对快速；出口结构的变化则体现为农产品、原材料和部分制成品的增长幅度较高（见表 2）。车辆、机器设备和光学仪器等制成品的出口扩大体现了拉美出口能力的长足进步，也表明该地区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有所提升。

表 2 拉美国家进出口增长率最高的前十种商品（2006—2021 年） (%)

拉美进口			拉美出口		
HS 章	名称	增长率	HS 章	名称	增长率
30	药品	1.18	26	矿砂	4.71
31	肥料	1.07	12	油果仁	2.50
72	钢铁	0.78	87	车辆	2.48
38	杂项化学制品	0.67	84	核反应堆、锅炉、机器、机械器具及其零件堆	1.67

10	谷物	0.52	71	珠宝、硬币、贵金属、首饰	1.51
39	塑料	0.41	08	水果	1.10
12	油果仁	0.37	10	谷物	1.03
23	饲料	0.34	02	肉	0.89
02	肉	0.31	90	光学仪器	0.74
15	油脂、油蜡制品等	0.29	23	饲料	0.66

资料来源：根据 Trade Map 贸易统计数据计算。

与拉美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下游的位置相一致，拉美制造业出口能力的提升集中在中技术密集部门。具体而言，在 2006—2021 年期间，中技术密集型制成品在拉美制造业出口中上升幅度最大，从 40.5% 增至 48.8%；高技术密集型制成品的比重则从 33.0% 降至 30.8%，但占比仍相对较高；低技术密集型制成品的出口保持稳定；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则有了一定下降，占比从 11.0% 降至 9.7%（见图 6）。故而可以判断，尽管拉美地区主要处于生产加工的下游环节，但其近年来主要承接的是中技术密集型产业，并未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有太多新建树。这一产业转移的倾向一方面源于拉美自身劳动力的年龄结构已开始上升，古巴等国家甚至有明显老龄化趋势，而地区劳动力供应也相对有限；另一方面则是源自地区日益受到《美墨加贸易协定》等新一代贸易规则的影响，在劳工保护相关条款的制约下，劳动力成本的下降空间有限，很难在“亲劳工”的制造业部门取得更多进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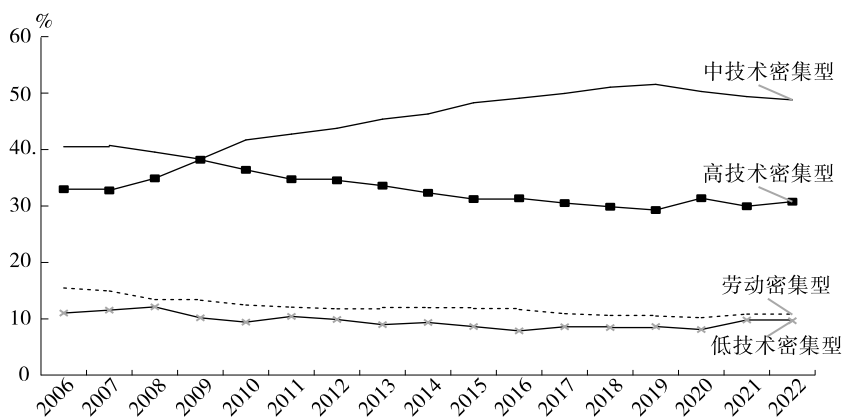


图 6 拉美出口产品集中度分布 (2006—2022 年)

资料来源：根据 Trade Map 贸易统计数据分类计算。



### 3. 贸易流向结构

2006—2021 年期间，拉美在全球价值链中参与度提升的同时，其区域内贸易占比从 19.3% 降至 14.5%<sup>①</sup>。因此，拉美的价值链贸易主要推动区域对外贸易增强，在内部的产业分工协同甚至有所回退。拉美的贸易流向具有较高集中度，在本文考察期内，其进出口主要流向中美欧三大经济体，新增贸易伙伴则集中在亚洲地区。

在整个考察期内，拉美贸易流向结构的突出特征表现为美欧贸易占比下降、中国贸易占比大幅增加。但是，全球价值链重构，特别是美欧推出的产业政策和外包政策，使其贸易流向有阶段性调整。具体而言，对应于拉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小幅跳升的 2016 年和 2018 年，美国在拉美进出口中的比重同步由下降转为上升，在出口中的增幅相对更大；欧盟在拉美出口中的比重也调转下降势头，出现回升；中国在拉美进出口中的比重则在此两个时点后进一步上升（见图 7）。结合拉美与三大贸易伙伴贸易产品种类和结构的变化，可以判断，随着拉美进一步融入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向美国和欧盟出口有集中态势，出口增加值有所上升；对中国的出口出现了量质同升，在出口种类更加多元化的同时，出口增加值有所上升。在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加速调整之后，中美两国在拉美地区并未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化，反而启动了同步增长；而拉美在承接全球产业链的转移后，获得了同步扩大中、美、欧三大市场占有率的能力，其出口能力正在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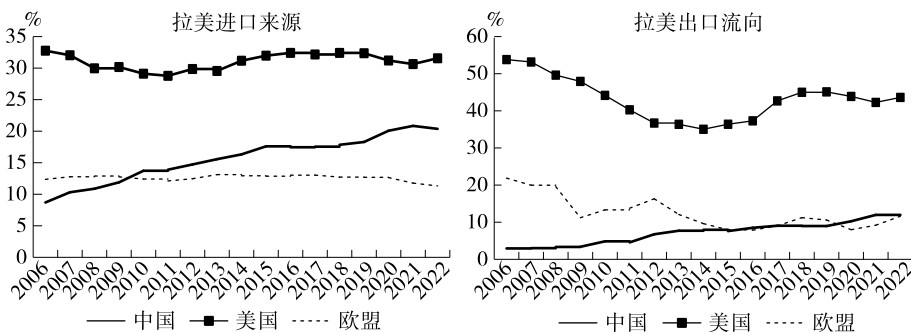


图 7 拉美贸易流向 (2006—2022 年)

资料来源：根据 Trade Map 贸易统计数据分类计算。

<sup>①</sup> UNCTAD 在线统计数据。https://unctadstat.unctad.org/datacentre/dataviewer/US.IntraTrade.[2023-08-09]

## （二）拉美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条件与制约

从拉美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近期变化来看，该地区已对“泛安全化”价值链重构政策做出响应。从“在岸外包”以来的拉美产业变化情况来看，其承接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转移短期内存在突出的地理、制度和规则“距离”优势，特别是全球新冠疫情和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引发的对供应链韧性的关注，凸显了其既有优势。同时，拉美地区还有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的中长期优势：一是禀赋优势，地区多数国家能源和资源储量丰富，能够支撑其持续在产业上游加入全球价值链；二是产业优势，地区商品贸易结构发生积极变化，要素配置在出口加工等外向型产业方面发生倾斜，而该地区持续成为近年来全球直接投资流入较多的区域<sup>①</sup>，也将有利于其未来进一步加速融入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三是绿色优势，在各国碳排放承诺的背景下，减少“碳足迹”的需求上升，客观上推进西半球国家缩短供应链，出台类似美国《通货膨胀削减法案》的政策，对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进行补贴，这将有利于以墨西哥为代表的部分拉美国家进一步融入北美新能源供应链和产业链。

然而，拉美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也受到三重制约。一是外部政策有效性制约，拉美加速融入全球价值链客观上得益于美欧等西方国家推行的“在岸”“近岸”和“友岸”外包政策，但此类政策对前期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分工进行干预，必须辅之以相应的资源倾斜，而受拉美自身经济影响，上述政策的资源匹配不充分和不到位的问题已经显现，政策效力受到影响。二是内部一体化制约，截至2022年，拉美地区的区域内贸易占比仅为15.1%，远低于亚洲的58.7%、欧洲的68.5%和北美地区（墨西哥除外）的30.6%<sup>②</sup>，而从当前价值链调整的情况来看，拉美地区虽已形成一定的产业分工异质性，但还未能形成地区大生产网络，从而削弱了其集成优势。三是治理能力制约，拉美国家营商环境的国际排名偏低，在新冠疫情、中美竞争和乌克兰危机等极限压力下，现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瓶颈”因素未及体现，但社会治理困境加大了地区营商环境和政策的不确定性，加大了其供应链波动风险，削

<sup>①</sup> 拉美经委会（CEPAL）发布报告显示，2022年拉美地区吸引了2245.8亿美元的直接投资，同比增长达55.2%，创历史新高，直接投资占该地区GDP的比重升至4%。拉美地区吸引的直接投资中，41%流向巴西，巴西贡献了该地区最多的直接投资增量，也是世界第五大直接投资目的地。在巴西后，吸引直接投资排名第二到第四位的依次是墨西哥（17%）、智利（9%）、哥伦比亚（8%）。美国和欧盟是该地区最大的直接投资来源国，占比分别为38%和17%。

<sup>②</sup> UNCTAD在线统计数据。<https://unctadstat.unctad.org/datacentre/dataviewer/US.IntraTrade>。  
[2023-08-09]

弱了地区原有优势。

因此，拉美具有进一步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潜力，产业链和供应链向该地区转移的态势还将在中短期内持续。但是，该地区面临着内外部制约，意味着其应进行必要的产业升级和政策调整，加大对外开放，才能最终强化其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

#### 四 结论及中拉合作的思考

2016 年以来，拉美已经开始加速融入全球价值链，其变化态势体现了全球产业调整的新趋势，在供应链安全持续受到高度关注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下，这种调整仍将持续。拉美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体现了不同次区域板块的相对优势和未来趋势，加勒比和中美洲地区以及墨西哥拥有地缘优势，这将促使其在产业链下游深入发展；南美国家拥有能源资源禀赋优势，将持续在产业上游发挥作用，但已在全球价值链布局中成为短板地区，而市场规模和相对近岸优势使其有条件进一步提升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在临近消费终端的产业下游加大参与。

在拉美地区整体价值链参与度上升的情况下，该地区尚未对中国形成替代冲击，其对中国和亚洲地区贸易近年来持续大幅增长，中国企业对该地区的投资也在不断加大。这表明，拉美在产业调整中，除了加深嵌入临近的北美价值链和欧洲价值链外，也在加大与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价值链之间的联系。在此种背景下，中拉经贸合作应适应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趋势和拉美产业调整的新态势，基于中国双循环新格局的建设需要，在战略和战术上积极调试。

在合作战略上，要重视拉美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的特殊性，应看到在地区国家“再工业化”的强烈诉求和西方国家供应链安全的政策转向下，该地区必将成为“在岸外包”“近岸外包”和“友岸外包”三重调整的叠加受益者。为此，中国应针对拉美市场特性，及时进行战略布局，一方面保持在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中的联系，规避游离于全球主流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则盯住在拉美市场及其溢出市场的占有率，保障经济安全和企业健康发展。

在合作战术上，要发掘拉美不同国家的差异性，利用该地区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面临的制约条件形成的时间和空间条件，有针对性地进行产业转移、

合作与政策协调。针对加勒比地区和中美洲和墨西哥地区临近发达市场的特性，应在消费型产业，如家电产业、汽车产业、纺织和服装产业、软件应用和游戏开发等部门采取追随战略，跟随西方国家跨国公司的调整，在这两大次区域建立地区性分包和组装工厂，确保市场占有。同时，基于加勒比地区和中美洲地区均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有了扎实的基础，且这两大次区域也是美国建设自由贸易区的核心地带，中国应加快同该地区开展自由贸易谈判，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发展，降低企业跟随进入的成本。针对南美地区能源资源丰富、消费水平在新兴市场相对较高的特性，中国应在产业发展的上游环节适当加大大地化开发，满足南美国家提升出口增加值的需求；在产业发展的下游环节，充分发掘当地出口加工区等政策红利，加大对消费型产品的本地组装生产和消费，提升该地区同中国之间的产业联系和价值链嵌入。

在合作方向上，应通过拉美消除可能形成中国可替代性的因素。由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具有产业异质性和技术同质性，这使得以中国为典型的制造大国长期处于“代工生产”地位，从而具备可替代性。为此，中国在与拉美的未来价值链合作中，应利用产业上的先发优势，主动加大对价值链两端高附加值区域的开发。在产业上游区域，应加大中国品牌建设和技术研发环节的投入，推动自身由“代工厂”向“发包方”的转变，提升对产业的上游控制能力。在产业下游区域，则应重视服务专业化和独立化的趋势，将培训、销售、售后和维修等不同环节进行专业分工，提高服务价值，提升在产业终端环节的影响力。

(责任编辑 黄念)